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JIAZHILIXING YU ZHONGGUO WENLUN



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

劉文勇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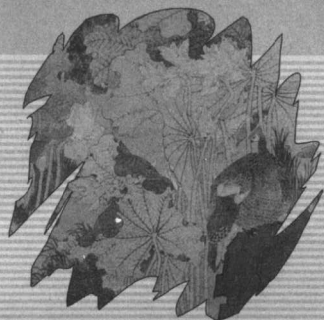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四川大學十五“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項目

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

劉文勇 著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 / 劉文勇著.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6. 6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

ISBN 7-80659-838-3

I. 價... II. 劉... III. 文學理論—研究—中國—古代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53132 號

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

劉文勇 著

責任編輯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張	8.875
字 數	220 千
書 號	ISBN 7-80659-838-3/I·264
定 價	22.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比較文學與文藝學叢書》編委會

主 編：曹順慶

編 委：馮憲光 王曉路 李 怡

徐新建 劉亞丁 閻 嘉

吳興明 劉文勇 段志洪

秘 書：姜 飛

序

曹順慶

文勇君的博士論文即將出版，囑我作序，我很樂意，但是也很躊躇，躊躇的是我作為論文的導師來作序怕陷於主觀或者偏頗，因為如此，所以我先引用文勇君博士論文的專家評閱意見來開頭：

《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是一篇頗有學術分量的博士學位論文。論文的選題及其構思立意，比較新穎大膽，很有創意。作者能夠根據目前學界存在的重大論爭和懸案，有為而發，針對性強。作者指出，在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古代（特別是儒家）的價值理性或價值觀在現代以來備受誤解和指責，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古代文論價值層面的真精神真面貌”。此論給人以有益啓迪。我個人同意這一論斷，認為它具有現實的理論參考價值。在論述中，作者的許多觀點頗多創新意識，如對古代文論中的傳統教化說、美刺說、形上形下、外王內聖諸多方面的比較和闡說，細緻分析，並能從正反方面進行比較，既具有縱向的歷史豐富內涵，又具有橫

向的空間張力，頗見氣勢和激情，從而給人以震撼。加以作者理論思辨活躍，具有相當的傳統基礎功底，能夠貫通古今，馳騁中外，言必徵信，持之有故，因而結論有說服力。

——復旦大學蔣凡教授評閱意見

在當代古代文論的研究中，對於儒家文論（尤其是漢儒與宋儒）存在曲解或誤解以及情緒化的過激評論（這種傾向近年來已有一些學者予以糾正），在當代文藝領域中，出現非理性的思潮，與古代非理性的思潮發生共鳴，本文作者提出對古人要有“瞭解同情”，從價值理性的角度肯定古代文論（主要是儒家主流文論）的價值是具有現實針對性和重大的理論意義的。但歷史是複雜的，文學藝術又是複雜的，因此也要防止從一端走向另一端。本文引用西方的概念“價值理性”，闡明古代的思想，是比較適宜的，有助於對古人的理論作現代詮釋。本文對是非異同的辨析精細入微，善於要約地概括理論的核心內涵（如將儒家的形上文論歸結為“天地境界”，道家的形上文論歸結為“自由”），表現出很强的思辨能力。本文的理論觀點的獨創性也是很突出的。作者的國學根柢是厚實的，每一重要論點的確立，都能旁徵博引，提供堅實的文獻依據，加以邏輯的嚴密，因此論文能以雄辯的力量說服讀者。作者也能廣泛地吸取研究成果，從中得到啓示，並充實立論的基礎。

——中國人民大學蔡鍾翔教授評閱意見

中國古代文論中的價值理性問題，集中體現在儒家對文學的種種要求之中。這一貫穿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在“五四”以來受到強烈的批判和否定。本文立足探索古代文論價值論的歷史真貌，並以現代文論的眼光予以闡釋和論述，極有意義，可謂選題甚佳。

文章選擇了古代文論中的“教化說”等五個論題，從價值理性的角度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糾正了若干流行的偏見，體現了作者獨立思考的創新能力、扎實全面的專業基礎以及通貫古今的現實關懷，是一篇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博士學位論文。

——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評閱意見

我很同意這些專家的意見，從這些專家的意見中可以看出文勇君是一個很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術人，我為文勇君的論文得到這樣好的評價感到高興。當然，文勇君的論文並非十全十美，不可避免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但從總體上說，祇要他的論文自成體系，自圓其說，符合學術規範，有創新性，都應該鼓勵，這也是我作導師的一點體會。

中國的傳統文論是世界文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悠久的中國古代文化史上，它一直在有效地解說和闡釋着中國自己的文學，但是現當代以來，衆所周知，中國傳統文論受到很大的衝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中國傳統文論被衝擊到“邊緣”的地位，有時候甚至被當作了“異端”，這些發生在現當代中國文化史上的現象大家有目共睹，此處不贅述。但是，我要反問的是，

這樣的現象在文化上是“合理”或者“合法”的嗎？近現代的激進思想者認為：“是合理合法的。”當然，從黑格爾的“存在即是合理”的觀點看，是“合理”的，但是，我不得不說這樣的“合理”性是中國人自己對自己文化進行的“暴力”而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極其不合理的。近代以來，成為西方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不在少數（近代中國還不是完全的殖民地），但像中國人這樣自己摧殘自己的文化而自失對自己文化的自信心的現象可能僅此一見。這說明，近現代以來對傳統文化、文論的這一“反動”祇有情緒性上的依據，沒有學理上的依據和合法性。這也給百年後的我們提出了一個文化的學術的任務，那就是反思這百年的問題並糾正過去的傾向。

百年的文化痼疾當然不能憑幾個人的努力就可以一下子解決，需要文化界、文論界的同仁一起來理性地反思過去，或宏觀或微觀地從各個方面來進行這樣的文化工作，指出過去的失誤並為未來中國的文化文論的健全走向貢獻自己的一點力量。難能可貴的是，文勇君的這部著作就是這方面的一次有益嘗試，這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百年的文化文論問題，在宏觀上可以說就是“失語症”，對“失語症”這一看法，學界爭論很多，有支持者，有半支持者，有反對者，甚至有“嗤之以鼻”者，出現這樣紛雜的現象是正常的，但是，我仍然堅持認為，“失語”是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文論的事實，正如文勇君這部著作的引言第一部分中所說的“這些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總體來觀察，仍然無法駁倒現當代中國文論處於‘失語症’的事實”。“失語”已經是事實，但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認為自己沒有“失語”而繼續加重“失語”的程度，在這個問題上，我同意文勇君在論文中引用的余英時先生的那段話的看法：

如果這一“視西籍若神聖”的心態不能根本扭轉，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勢將長期停留在認同西方的流行理論的階段。族群的自我認同儘管現在已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世界現象，中國知識分子恐怕未必能把握住這一契機，而在中國的人文研究方面有積極的建樹。

——余英時《文化危機與民族認同》，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七，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頁

我說中國文論患了“失語症”並不等於我這個立說者就免疫於“失語”，這個問題上我很同意文勇君在引言第一部分中的另外一句話：“提出中國文論‘失語症’說的理論者也難逃自己也‘失語’的現實文化境遇。”這確實是一個事實，但我可以說我們現在是可以努力去做到少失語而不去繼續嚴重的有意的“失語”。如果我們這樣持續不斷的努力下去，我相信未來中國的文化文論的情況會有較大的改觀，未來的中國文化文論的“地圖”上不會到處都是西方的“權勢話語”的圖標，而可能的情况是，中國文化文論的話語在更大的範圍和更大的程度上言說和闡釋着自己。

當然，我這樣說並不是要讓我們自我封閉，成為世界文化與文論中的“孤立者”，我贊同陳寅恪先生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金明館叢稿二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52 頁）的看法。我相信，任何一個現在中國的提倡“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的人都不會愚蠢到去反對“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這樣去做本來也是徒勞。相反，我這樣說是希望中國文化與文論在世界文化與文論中獲得它應有的“個性”而不是與西方相同或相似，從而實現與西方真正對話的文化文論“事實”。問題的關鍵是，如果西方也能够用中國文化與文論的觀念與範式闡釋着他們的文化與文學，那麼中國用西方文化與文論的觀念和範式闡釋中國的文化與文學就是可以接受的事實，如果這樣，那麼西方就是“中國”，中國就是“西方”了，雙方文化與文論也是在對等與充分保持自己個性的基礎上對話。但現在的事實是，西方用西方的文化與文論的觀念與範式而不是中國文化與文論的觀念與範式在闡釋他們自己的文化與文學文論，而我們却基本上是用西方的文化與文論的觀念與範式而不是中國文化與文論的觀念與範式在闡釋自己的文化與文學文論，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遺憾、痛心的現實。當然，如果有人真正能够證明中國文化與文論就是“劣等文化與文論”，那麼我們可以接受這個現實，但遺憾的是，沒有人有這個能力來證明，而且這樣的證明永遠也不會成立。歷史告訴我們，用“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強弱來證明文化優劣僅僅是“強盜邏輯”而已，文化的東西還需要文化自己來解釋。

所以，我們需要恢復和樹立我們的文化自信心，在反思中前行，去展望和創造未來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和文論。

2004 年 9 月於四川大學

民歌與國學——民國早期「歌謠運動」的回顧與思考 徐新建 著

大陸臺灣比較文學理論研究 鄧時忠 著

價值理性與中國文論 劉文勇 著

未完成的審美烏托邦：現代中國文學自治思潮研究（1904-1949）馬睿 著

阿格妮絲·赫勒審美現代性思想研究 傅其林 著

從立場到方法——二十世紀國外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文藝理論研究 邱晚林 著

目 錄

序 曹順慶（1）

引 言 （1）

“不同情的瞭解”地研究傳統文論是二十世紀的普遍現象——對古代價值觀的誤解——價值理性與終極關懷——本文的思路與結構

第一章 價值理性與教化說 （27）

價值理性與教化說的關係的複雜性——為天下的教化與為一家一姓的教化——文學教化說的正面價值——文學教化說下一些具體命題的考察與評價

第二章 價值理性與美刺說 （95）

美刺與秉持公心——美刺與婉曲——“美”是有原則的且是有限的——刺的根據的探討——漢代美刺解詩美刺言詩再考察

第三章 價值理性與“詩可以怨”說…………… (133)

爲天下而怨與爲己而怨——怨與價值理性直接合一與間接合一——怨而不怒與怨而怒——怨而不怒是一個面而不是一個點，怨而怒亦然——激揚以抵和平的“怨”

第四章 價值理性與風骨論…………… (164)

風骨不僅是一個藝術美學概念，更是一個價值理性上的概念——儒家風骨論與陽剛入世的憂患意識、批判精神——道家風骨論與陽剛超世的情懷

第五章 價值理性與形上文論…………… (206)

形下外王弘道與形上內聖弘道——天地境界與儒家形上文論——“自由”與道家的形上文論

結 語…………… (253)

主要參考書目…………… (260)

後 記…………… (271)

引言

近年來，學界對現當代中國文論的狀況的反思成了一個熱點，這些反思雖然帶有一定的情緒性，但是客觀地看，其反思所得出的結論又無不是事實的真實寫照，這以季羨林先生的說法最具代表性。季先生指出：“反觀我們東方國家，在文藝理論方面噤若寒蟬，在近現代沒有一個人創造出什麼比較有影響的文論體系，王國維也許是一個例外。沒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傳入西方，起了影響，引起轟動。”^① 季先生的觀察也許令許多現當代文論的寫作者不服氣，但是事實就是事實，無論怎樣也無法改變這一事實。

① 季羨林《東方文論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現當代中國文論如此尷尬，但是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這一狀況的呢？是不是中國現當代學人失去了創新的理論勇氣了呢？顯然不是，問題的癥結恰好出在如何創新上，故其真正的原因恐怕不能不是創新的勇氣背後沒有了本民族的傳統和人文精神作支撐，以至於其所謂“創新”就不得不是追隨西方論說的同義語，西人既已言說在先，故追隨也就自動喪失“創新”的意義。此一層面，孫津先生曾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沒有理論，這是我說的，至少現在是這樣。當我們要用理論來講話時，想一想吧，舉凡能夠有真實含義的或者說能夠通行使用的概念和範疇，到底有幾多不是充分洋化了的（就算不是直接抄過來）。如果用人家的語言來言語，什麼東西可以算得上中國自己的呢？”^①而曹順慶先生則以“文化病態”與“文論失語症”來對此作出觀察和評論：“中國現當代文壇，為什麼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聲音？其基本原因在於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症。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則。我們一旦離開了西方文論話語，就幾乎沒有辦法說話，活生生一個學術‘啞巴’。想想吧，怎麼能期待一個患了嚴重學術‘失語症’的學術群體在世界文論風起雲湧的時代，獨樹一幟，創造自己的有影響的文論體系，怎麼能在各種主張和主義之中爭妍鬥麗！”^②曹先生的“失語症”的提法一出，既受到不少人的贊同，也受到不少人的批評，批評者中甚至有認為這是“文化原

① 孫津《世紀末的隆重話題》，《文藝爭鳴》1995年第6期。

② 曹順慶《文論失語症與文化病態》，《文藝爭鳴》1996年第2期。

教旨主義”，以為此一傾向“以傳統來解釋、定義和捍衛傳統，而不是把傳統本身看做一個發展的變化的範疇”^①，這些批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從總體上來觀察，仍然無法駁倒現當代中國文論處於“失語症”的事實。可以指出的是，提出中國文論“失語症”說的理論者也難逃自己也“失語”的現實文化境遇，但他們為走出“失語”的圍城而論說的理論勇氣還是值得欽佩的。

如果放開視角來觀察，則不僅現當代中國文論的寫作或創作處於“失語”狀態，而且對傳統中國文論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處於“失語”狀態，此一傾向表現為對中國傳統文論的個性缺乏充分的瞭解之同情，以西釋中、以今律古成為較為普遍的現象。傳統中國文論多是為社會、為人生的文論，而二十世紀對中國傳統的文論的研究在總體上（一些學者還是進行了很有瞭解之同情的研究）背離了這一傳統，在“科學整理國故”的口號下把傳統文論變成了一堆西學式的“知識”，但見文字，不睹性情，既不見今人的性情，亦不見古人的性情，以致造成對傳統文論真相、真精神的多方面的遮蔽。不少研究者在研究傳統文論時，首先就先驗地確定了一個純文學的概念并以此去衡量傳統文論，以致對古人的“文”的概念不能產生足夠的同情，事實上，今人所重者往往為古人所輕，反過來，則是古人所重者又往往為今人所輕。傳統文論是已然過去了的理論，從廣義的歷史學的角度看，它已經成為歷史，既是歷史，那研究之則應該是以歷史主義的態度，應該返其舊心尊重它纔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否則就成了

① 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頁。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自由詮釋而不是客觀的學術研究了。錢穆先生針對現當代對中國傳統文學的研究曾經作過這樣一個評論：“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凡孔子平日告其弟子，詩書禮樂，皆文章也。即後世經史子集四庫之書，亦皆稱文章。不僅如此，即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一國之典章制度，乃至如一賢人一君子之出處言行，如屈子之沉湘，董子之三年目不窺園，揚子雲之下簾寂寂，嚴光之垂釣富春江，諸葛孔明之六出祁山，鞠躬盡瘁，此亦莫非一時代之大文章……孔門四科，游夏文學，亦乃為文章之學，乃稱文學，而亦豈特詩歌辭賦駢散諸文之始為文學乎？故中國，如屈宋乃至如司馬相如諸人，為辭賦家。陶、謝、李、杜為詩家。韓、柳為古文家。而獨無文學家之稱。今日國人之稱文學，則一依西方成規，中國古代學術史上無之。此雖一名稱之微，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今日國人競稱中國文學，乃亦以文章為文學，則其厭棄舊文學豈不并孔門游夏文學一科而亦加厭棄，此又不可不辨。”^①“是則欲深通中國之文學，又必先通諸子百家。故曰徒為一文人，斯無足觀。今人則一慕西方，專治文學，欲為一文學專家，以此治中國文學，寧得有當。”^②以此標準觀察，對傳統中國文論的研究也不會比研究傳統中國文學的情況好到哪裏去。

呂思勉先生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就有類似的看法和批評：“讀諸子者，固不為研習文辭。然諸子之文，各有其面貌性情，

① 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北京三聯書店 2001 年版，第 256—257 頁。

② 同上，第 248 頁。